

科技右翼的崛起与美国权力结构的重组^[1]

陶 欢 翟东升

【内容提要】随着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科技右翼作为新兴政治力量正式登上政治舞台。该群体融合硅谷企业家、风险投资人及意见领袖，秉持右翼加速主义理念，主张技术至上、放松监管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技术精英威权治理。通过政治献金、人事输送与决策咨询，科技右翼将其理念植入共和党与国家议程，推动美国科技、国防与行政体制系统性重组，权力与资源持续向硅谷集中。科技右翼正推动跨大西洋防务关系向以美国技术标准为核心的防务技术联盟转型，形成“硬件欧洲化、技术美国化”的依附格局。未来，该群体可能从两方面对中国技术崛起构成战略夹击：一方面推动军用技术标准向民用产业与全球技术治理领域外溢，挤压中国技术标准的国际影响力；二是以技术民族主义凝聚共和党共识，强化对华科技遏制，压缩中国技术的全球市场空间。

【关键词】科技右翼 加速主义 技术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 美国政治

【作者简介】陶欢，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6) 01-0121-31

[1] 本文系2025年中国人民大学—西湖大学未来人类联合研究院青年研究员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5RD0302)和中国人民大学“求是学术”育人育才项目(项目编号:RUC25QSDL16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随着特朗普在 2024 年美国大选中胜选，一个以硅谷精英为核心的新兴政治力量——“科技右翼”（Tech Right），正式登上美国政治舞台。该群体由秉持右翼加速主义（Right-wing Accelerationism）理念的技术精英、风险投资人与意见领袖构成。他们打破了硅谷长期依附民主党的传统，主动联合右翼民粹势力，并通过政治献金、人事输送等方式，系统性地介入国家政治进程，实现了从幕后游说到前台参政的关键转变。

右翼加速主义作为一种颠覆性政治哲学虽已有之，但其能够与硅谷深度融合并最终进入美国政治主流，归功于硅谷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等核心人物的长期布局。科技右翼不仅正在改变美国权力格局、重构国家制度结构，更将深刻塑造美国对外战略的方向与手段，尤其是对华政策的逻辑与工具。本文旨在通过梳理科技右翼形成的思想源流，系统阐释这一新兴力量是如何重构美国权力格局、转变其对外战略逻辑，并对全球秩序以及中国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带来多维度、系统性的新型挑战，为学界和实务界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一、科技右翼的兴起：从思想源流到政治合流

科技右翼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右翼加速主义思潮历经数十年演进，最终通过彼得·蒂尔等关键人物的政治实践，完成了与硅谷资本、技术权力及共和党政治议程系统性整合的结果。该演进历程以“PayPal 黑帮”^[1]为核心纽带，将一种边缘思潮转化为具有明确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新反动主义运动”（Neo-Reactionary Movement）。在拜登政府强化监管政策的外部压力下，科技右翼与硅谷建制派进一步合流，形成以“有效加速主义”为旗帜的“硅谷共识”，并借助 2024 年美国大选，实现了从理念传播到深度介入政治并实质性影响国家决策权力的历史性跨越，标志着美国权力结

[1] “PayPal 黑帮”是硅谷对 PayPal 早期核心成员及创始人的统称。该群体在 PayPal 被收购后，大多转向创业或投资领域，成功催生了多家具有行业颠覆性的科技公司，成为塑造硅谷创新生态的关键力量，其代表人物包括彼得·蒂尔、特斯拉与 SpaceX 创始人埃隆·马斯克、Affirm 创始人马克斯·列夫琴等。

构迎来一次深刻重组。

（一）理论奠基：从加速主义哲学到新反动主义纲领

“加速主义”一词最早见诸美国科幻奇幻作家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1967年的科幻小说《光明王》，但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至更早的哲学与社会理论脉络。^[1]该思潮的核心在于通过有意识地加速推动技术发展，并主动激化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以促使当前社会秩序发生根本性变革乃至系统性转型。其思想建构主要植根于三大理论源流之中：其一，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技术进步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会不断加剧资本主义的内部冲突，甚至加速其走向危机。这种将“发展”与“危机”紧密挂钩的历史辩证法，为加速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起点——即“加速”本身可以成为打破现状的力量。其二，它吸收了尼采哲学中“以危机促蜕变”的激进态度。尼采曾呼吁“加速欧洲人的均衡”，主张通过彻底的震荡和重构来推动文明新生。这为加速主义者提供了行动哲学——不必惧怕系统性崩溃，反而应主动促成危机，以求“破而后立”。其三，它借用了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的“去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作为理论工具，主张通过主动加速资本主义内在的流动、解构与破坏性力量，使其冲破现有体系的边界，从而为后资本主义图景开辟可能。^[2]

真正的分化与蜕变发生于二十世纪末，英国华威大学控制论文化研究中心（CCRU）成为加速主义成形的重要思想熔炉。在该中心学者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尼克·兰德（Nick Land，本世纪初以来长期居住在中国上海）等人推动下，加速主义思想逐渐裂变分化为左、右翼两派。2013年，

[1] 参见 Karl Marx, “Fragment on Machines,” in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eds.,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Falmouth: Urbanomic, 2019, p.51。

[2] 去辖域化是对“辖域化”的反向操作。辖域化指事物被固定在特定的时空、规则或结构中（如国家边界、社会规范、传统观念等），而去辖域化则是从这些固定框架中挣脱，追求自由、流动与差异的过程。参见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加拿大经济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和英国政治学者艾利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发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系统阐发了左翼加速主义主张，即通过驾驭先进技术与基础设施，超越资本主义，构建普遍富足的后资本社会。^[1]与之相对，尼克·兰德等人则向右翼发展，主张通过加速技术创新与市场扩张来强化资本主义体系，推崇技术精英主导的社会演进模式。

2007年，美国政治学者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发起“新反动主义运动”，开始系统阐述该思潮的基本理念。此后，兰德等学者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雅文的思想，不仅创造了“黑暗启蒙”（Dark Enlightenment）一词，还将这一理论体系整合至其加速主义框架之中，完成了右翼加速主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统一。^[2]兰德据此构建起该思想的核心主张，形成一套涵盖科技、社会文化及政治三个维度的技术政治纲领。^[3]在科技维度，信奉技术至上主义，主张解除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及加密货币等领域的一切伦理与规制束缚，以全力推动“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的到来；在社会文化维度，明确拒斥平等主义，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将主流媒体、高等教育与官僚机构所构成的进步主义网络斥为“大教堂”^[4]（the Cathedral），主张予以拆解；在政治维度，否定民主体制，倡导建立类似公司治理结构的“新君主制”，将国家权力集中于单一组织，依靠技术精英官僚结合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实现高

[1] 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Critical Legal Thinking*, May 14, 2013, <https://criticallegalthinking.com/2013/05/14/accelerate-manifesto-for-an-accelerationist-politics/>.

[2] “What We Must Understand About the Dark Enlightenment Movement,” *TIME*, March 24, 2025, <https://time.com/7269166/dark-enlightenment-history-essay/>.

[3] Nick Land, *The Dark Enlightenment*, Perth: Imperium Press, 2023.

[4] “大教堂”是雅文提出的核心政治隐喻，指代由高等教育机构、主流媒体、官僚体系及依附其中的知识精英所构成的隐性权力网络。该网络通过垄断教育、舆论与话语生产，系统性推行进步主义价值正统，实际主导着现代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议程，因而被描绘为超越形式民主的“深层权力中心”。参见 Andrew Woods, “Cultural Marxism and the Cathedral: Two Alt-Right Perspectives on Critical Theory,” in Christine M. Battista and Melissa R. Sande eds.,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Humanities in the Age of the Alt-Right*,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9, pp.39-59.

效治理，并强调政府雇员对领袖的个人效忠。^[1]至此，右翼加速主义已从一种激进的哲学构想，演变为一套融合了技术乌托邦愿景、反民主政治设计与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的完整行动方案，为其后的政治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关键纽带：彼得·蒂尔与右翼加速主义的政治整合

彼得·蒂尔是将右翼加速主义从思想理念转化为现实政治力量的关键人物。作为“PayPal 黑帮”的核心成员、硅谷顶尖的风险投资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蒂尔兼具资本实力、技术远见与意识形态影响力，这使他成为连接硅谷、华尔街与华盛顿的独特人物。他在南非成长期间，亲历了反种族隔离运动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并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大卫·萨克斯等人有着相似的早年经历，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他对自由主义秩序产生深刻质疑，也让他对多元文化主义与进步主义的批判态度愈发坚定。2009 年，蒂尔撰文宣称“我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是相容的”^[2]，标志着其意识形态彻底转向保守主义，并为其后续推动硅谷科技精英与右翼政治合流奠定了思想基础。

蒂尔主要通过四个层面系统推进右翼加速主义思潮的政治实践：在思想传播层面，长期与“黑暗启蒙”理论家柯蒂斯·雅文保持密切联络，并通过投资其初创公司 Tlon 等方式，支持“新反动主义”理念的传播。^[3]在资本整合与生态培育层面，通过蒂尔资本和创始人基金等风投机构，为理念相近的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受益人包括车载激光雷达公司 Luminar 创始人奥斯汀·拉塞尔（Austin Russell）、以太坊联合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安杜里尔创始人帕尔默·勒基（Palmer Luckey）等^[4]，投资覆盖人

[1] Harrison Smith and Roger Burrows, “Software, Sovereignty and the Post-Neoliberal Politics of Exit,”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38, No.6, 2021, pp.143-166.

[2] “The Education of a Libertarian,” Cato Unbound, April 13, 2009, <https://www.cato-unbound.org/2009/04/13/peter-thiel/education-libertarian>.

[3] Corey Pein, *Live Work Work Work Die: A Journey into the Savage Heart of Silicon Valley*, Metropolitan Books, 2018, p.146.

[4] “Peter Thiel on the Dangers of Progress,” December 30, 2022, <https://unherd.com/2022/12/peter-thiel-on-the-dangers-of-progress-2/>.

工智能、加密货币、国防科技等前沿领域，逐步构建起一个认同加速主义价值观的科技精英群体。在国防安全层面，持续推动硅谷与国家安全体系深度融合。2003年创立的帕兰蒂尔公司（Palantir）专注于为国防与情报机构提供服务，承接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核心项目，为硅谷保守势力与国家安全系统建立制度性通道，并借此拉拢国安体系内的保守派力量。^[1]在政治动员与人事布局层面，蒂尔不仅是硅谷最早公开支持特朗普的企业家之一，还持续资助理念相近的政治新人竞选国会议员，如对帮助万斯当选国会议员以及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逐步在政治体制内植入科技右翼的代表人物。

（三）集团形成：科技右翼的构成与跨领域动员能力

在系统性理念传播与政治整合的推动下，认同右翼加速主义的硅谷群体逐步壮大，形成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科技右翼利益集团。该集团以“PayPal黑帮”为核心纽带，其成员主要包括三类群体：一是硅谷企业家与技术精英，以马斯克、布莱恩·阿姆斯特朗（Brian Armstrong）等为代表，掌控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国防科技及加密货币交易所等关键平台，并将右翼加速主义思想融入企业组织原则与发展战略；二是风险投资人群体，以蒂尔、萨克斯、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等为核心，通过资本运作引导创业企业与科技公司认同其意识形态^[2]；三是意见领袖群体，包括雅文、兰德、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等知识分子与媒体人物^[3]，借助学术著作与社交平台，推动右翼加速主义从边缘思潮进入主流议程。

[1] RJ Gonzalez, “How Big Tech and Silicon Valley Are 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Brown University, 2024.

[2] Scott Rosenberg Primack Dan, “Andreessen, Horowitz Embrace Trump as Tech’s MAGA Camp Swells,” Axios, July 17, 2024, <https://www.axios.com/2024/07/17/trump-andreessen-horowitz-tech-billionaires>.

[3] Ian Ward, “Curtis Yarvin’s Ideas Were Fringe. Now They’re Coursing Through Trump’s Washington.,” *Politico*, January 30,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5/01/30/curtis-yarvins-ideas-00201552>.

科技右翼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成员的复合身份与强大的跨领域动员能力。以蒂尔为例，他既是军工领域的重要投资人，也是活跃于公共舆论场域的意见领袖；马斯克则同时掌控 SpaceX、特斯拉等实体科技企业与社交平台 X，实现了资本运作、技术掌控与话语权的深度整合。这种多重身份的重叠，使其能够在资本、技术与舆论三个关键维度上实现资源的垂直整合与政治诉求的高效传导，从而极大提升了集体行动的能力与效率。

凭借这种复合身份优势，科技右翼得以从舆论操控与知识生产两个层面，系统推动右翼加速主义理念向美国社会与政治核心渗透。在舆论层面，其依托 X、Rumble 等平台，进行选民数据采集及内容定向推送，将加速主义理念持续触达并影响关键选民群体与政治决策层。在思想层面，则通过资助学术研究机构与智库^[1]，持续产出并传播以“去监管、反进步主义、质疑民主体制”为核心的一系列主张，从而在高等教育界与决策圈中逐步确立其话语主导权。这一渗透策略已取得显著成效，知名媒体评论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等保守派重要人物已成为右翼加速主义理念的支持者和传播者。^[2] 2023 年，右翼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25 计划》（Project 2025）更为特朗普可能的第二任期拟定了一套系统的右翼加速主义政治蓝图，内容涵盖强化行政权力、裁撤教育部、精简联邦机构并全面废止“多元、公平与包容”（DEI）项目等。^[3] 此举标志着科技右翼势力与右翼民粹势力及共和党传统保守派之间形成了政治共识，加速主义已然完成了从理论建构向实

[1] 智库和学术机构包括传统基金会、斯坦福大学、卡托研究所、克莱蒙特研究所等。参见 P. S. L. Webmaster, “Meet Peter Thiel: The Tech Billionaire Influencing Top Member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Liberation*, December 6, 2024, <https://liberationnews.org/peter-thiel-tech-billionaire-influencing-top-members-trump-administration/>.

[2] Bahram Sarmast, “The Technocratic Monarchist Movement in America: Theoretical Dimensions and Political Impact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Society, Law, and Politics*, Vol.4, No.3, 2025, pp.1–13.

[3] “What Is Project 2025? Wish List for Trump Second Term, Explained,” BBC, June 12, 2024,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977njnvq2do>.

质性政策议程的关键转变。

（四）共识构建：外部政策压力下的“硅谷合流”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在加利福尼亚州获得的得票率达到 38.3%，较 2016 年大选时提升了 6.7 个百分点，这一变化折射出硅谷政治生态的结构性转向。^[1]促成该转向的核心机制，在于拜登政府的监管政策对硅谷形成系统性压力，迫使长期秉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硅谷建制派，与具有反建制色彩的科技右翼在利益层面走向合流，形成以“有效加速主义”为旗帜的“硅谷共识”。

在科技右翼看来，拜登政府施行的一整套以所谓进步主义价值观为驱动的监管政策，对硅谷的创新生态与资本逻辑构成系统性外部约束和压力。一是拜登政府将“环境、社会 and 治理”（ESG）、DEI、“觉醒主义”、女权主义为代表的进步主义议程强制嵌入联邦政府体系，并以此干预企业技术研发与运营。^[2]例如，近年来 Space X 为获取监管部门的星舰发射许可，不得不应对涉及海洋生物保护等异常繁琐的环保审查，并确保发射不会对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产生潜在负面影响，导致关键项目进度严重滞延。^[3]二是在反垄断领域，拜登政府对亚马逊、谷歌、Meta 等科技巨头发起的多起诉讼与并购限制，不仅制约其发展，更截断了风险投资及初创企业的退出

[1] 参见 California Secretary of State, “General Election, Statement of Vote, November 5, 2024,” <https://www.sos.ca.gov/elections/prior-elections/statewide-election-results/general-election-nov-5-2024/statement-vote>; “General Election, Statement of Vote, November 8, 2016,” <https://www.sos.ca.gov/elections/prior-elections/statewide-election-results/general-election-november-8-2016/statement-vote> 等。

[2] 参见 DeLon Thornton, “Why Some U.S. Companies Are Scaling Back DEI Programs,” CNBC, November 22, 2024, <https://www.cnbc.com/2024/11/22/why-some-us-companies-are-scaling-back-dei-programs.html>。

[3] 参见 Lex Fridman, “Transcript for Elon Musk: Neuralink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Lex Fridman Podcast, August 2, 2024, <https://lexfridman.com/elon-musk-and-neuralink-team-transcript/>; Ross Douthat, “How Democrats Drove Silicon Valley Into Trump’s Arm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7,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17/opinion/marc-andreessen-trump-silicon-valley.html> 等。

路径,影响到资本的自由流动。^[1]三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拜登政府出台的《人工智能的安全、保障和可信赖的开发与使用》等行政令,虽旨在确保系统可靠性与伦理合规,但高企的合规成本挤压了初创及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2]而最具冲击力的是,拜登政府在2024年提出的征收“未实现资本利得税”方案。^[3]所谓未实现资本利得税,是针对股票、房产等资产在持有期间增值部分(即“账面利润”)所征收的税项,无论该收益是否已通过出售实现。其目的在于克服传统资本利得税仅对“已实现收益”征税所造成的税收滞后、税负不公等问题,但这一税制设计在现实中颇具争议。该方案若实施,将直接冲击初创科技企业的资本结构与硅谷科技富豪的财富增值模式,已触及到硅谷的根本利益。上述在产业政策与财富分配上的根本性分歧,成为驱动硅谷集体反思并转向的关键外部推力。

面对共同的外部压力,科技右翼与硅谷建制派完成了从利益契合到理念重构的整合。尽管科技右翼与硅谷建制派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深刻分歧——前者具有鲜明的反建制、反民主、反平等主义特征,而后者偏向自由主义,政治上多倾向支持民主党,偏好通过专业游说影响政策走向,以维护其商业利益——但双方在应对AI监管、数据隐私与反垄断等核心议题上利益高度重合。这一重合为双方策略性合作奠定了现实基础。

[1] 参见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Promoting Competition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July 9, 2021,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7/09/executive-order-on-promoting-competition-in-the-american-economy/>。

[2]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the Safe, Secure, and Trustworthy Development and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ctober 30, 2023,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3/10/30/executive-order-on-the-safe-secure-and-trustworthy-development-and-us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3] 参见 The White House, “The President’s Budget Cuts Taxes for Working Families and Makes Big Corporations and the Wealthy Pay Their Fair Share,” March 11, 2024,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3/11/fact-sheet-the-presidents-budget-cuts-taxes-for-working-families-and-makes-big-corporations-and-the-wealthy-pay-their-fair-share/>。

有了合作基础，科技右翼便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创始人基金、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Andreessen Horowitz）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机构，系统构建吸纳硅谷建制派的利益网络。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右翼以董事会控制权、投票权与决策权等投资条款为杠杆，不仅注入资金，更深度介入被投企业的战略决策与治理结构，从而将技术精英、产业资源与自身意识形态等利益要素进行制度化绑定。这使科技右翼在资本层面完成了对硅谷传统权力格局的渗透与整合，逐步形成一个理念协同、利益共享的政治—商业复合体。^[1]

国防安全领域的巨大利益则为双方合流提供了关键契机。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卫星技术和云计算成为美国的核心战略关注点，从初创公司到传统科技巨头，整个硅谷生态都在更深层次上嵌入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一方面，亚马逊、谷歌、Meta、微软等硅谷建制派企业凭借其基础设施与技术能力，在2019至2024年间从美国军方获得总额超过630亿美元的合同^[2]；另一方面，以科技右翼为代表的风险资本也在同期推动超千亿美元流入国防科技初创领域，投资于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网络安全等前沿方向。二者共同构成了“科工复合体”（Tech-Industrial Complex）的扩张。在此过程中，科技右翼所倡导的“技术至上、去监管化、精简政府”等理念，正好为硅谷建制派全面进入国防领域、突破传统监管与伦理约束提供了思想指引，推动原本存在意识形态差异的两者在“技术赋能国家安全”这一目标下形成利益与理念的合流。

[1] RJ Gonzalez, “How Big Tech and Silicon Valley Are 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Brown University, 2024.

[2] 据非营利研究组织 Tech Inquiry 的数据，2018—2022 年间，全球三大科技公司——微软（135 亿美元）、亚马逊（102 亿美元）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43 亿美元）——累计获得价值约 280 亿美元的政府合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与情报系统的多项重要合同属于机密范畴，并未纳入公开采购统计，因此，上述科技企业所获政府合同的实际总金额，很可能远高于当前已披露的数据。参见 Jack Poulson, “Militaries,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Law Enforcement Dominate US and UK Government Purchasing from US Tech Giants,” Tech Inquiry, 2022。

在利益合流的推动下，硅谷建制派对右翼加速主义进行了“技术提纯”，剥离其反建制与种族主义等极端成分，提炼出以“技术进步与市场效率优先”为核心的“有效加速主义”。^[1]该理念迅速获得谷歌、微软、Meta、OpenAI 等企业高管及数万工程师的公开认同，标志着加速主义跨越极右翼思想边界，完成了在硅谷主流科技生态中的政治理念整合。

二、权力兑现与体制重塑：从选举渗透到政策主导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提出的“美国优先”主张蕴含零和博弈思维与反建制冲动，与科技右翼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及技术精英统治论形成了深层意识形态共鸣。双方在抵制多元主义、挑战传统治理逻辑、推崇实力主导的内外秩序等方面高度一致。正是基于这一战略契合，特朗普团队主动利用民主党与硅谷之间的政策裂痕，展开积极拉拢，最终在 2024 年大选中与科技右翼结为稳固的权力同盟——后者以巨额政治献金和高效组织动员为特朗普提供决胜支持，而特朗普则以放松监管、清除建制障碍作为政治回报。胜选后，这一同盟迅速从选举合作转向共治实践，共同推动了一场以行政集权、为科技资本松绑和大国竞争范式重构为核心的系统性变革。这不仅意味着美国权力格局的重塑，更标志着一套融合民粹动员、技术威权与民族主义的新型治理模式正逐步主导美国的内外战略方向。

（一）资本开路：科技右翼的选举运作与政治回报

特朗普对科技右翼的核心诉求作出了系统性回应。在社会文化领域，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觉醒文化”及 DEI 倡议，将废除进步主义议程作为其核心竞选主张之一；在科技监管方面，承诺撤销拜登政府颁布的人工智能相关行政令以放松管制，并自诩为“加密总统”，提出建立国家比特币战略储备、构建对加密货币友好的监管框架，同时表示将禁止央行数字货币的

[1] Ellen Huet, “A Cultural Divide Over AI Forms in Silicon Valley,” Bloomberg, December 6, 2023,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newsletters/2023-12-06/effective-accelerationism-and-beff-jezos-form-new-tech-tribe>.

发行^[1]；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延续并扩大针对中高收入群体与企业的减税政策，强调依靠“涓滴效应”刺激消费，以带动经济增长。这一系列竞选主张显著巩固了特朗普与科技右翼的联盟，也改善了硅谷建制派对其的政治态度——Meta、谷歌、微软等建制派企业表现出合作意愿，而加密货币、人工智能和国防科技等行业则普遍表示支持。

作为对这一系列政策承诺的直接回应，科技右翼在2024年大选中通过政治献金展开了关键性的选举动员。据数据显示（见图1），截至当年6月，硅谷对民主党的捐款原本大幅领先，但在“PayPal黑帮”等科技右翼骨干的推动下，叠加共和党方面推出的科技友好政策方案，助选资金流向发生显著逆转——特朗普所获资助反超哈里斯并持续扩大优势。在这一过程中，“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成为科技行业进行政治献金、施加政治影响力的主要渠道。^[2]福克斯新闻的数据显示，加密货币行业在2024年选举周期中向相关Super PAC注入超过1.19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向特朗普及共和党；马斯克向其控制的Super PAC投入超过2.9亿美元支持特朗普及共和党候选人。^[3]此外，科技右翼还借助Super PAC深度介入国会及地方各级选举，推动有利于科技行业的立法议程。例如，在密歇根州，马斯克支持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协助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候选人汤姆·巴雷特（Tom Barrett）成功击败竞争对手^[4]，这标志着硅谷资本成功在美国

[1] 参见 Landon Manning, “Donald Trump’s Crypto Blueprint: Top 10 Crypto Promises from the President-Elect,” BeInCrypto, November 7, 2024, <https://beincrypto.com/donald-trump-pro-crypto-election-victory/>。

[2] 企业和富人可以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无限量资金。唯一限制是，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能直接为竞选活动捐款，但他们可以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进行政治广告宣传。

[3] “Big Crypto, Big Spending: Crypto Corporations Spend an Unprecedented \$119 Million Influencing Elections,” Public Citizen, August 21, 2024, <https://www.citizen.org/article/big-crypto-big-spending-2024/>。

[4] Trisha Thadani and Clara Ence Morse, “Elon Musk Is Now America’s Largest Political Donor,”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6, 20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4/12/06/elon-musk-trump-campaign-spending-fec/>。

传统汽车制造业心脏地带植入了政治代理人，为特斯拉等科技企业在密歇根州的扩张扫清了政策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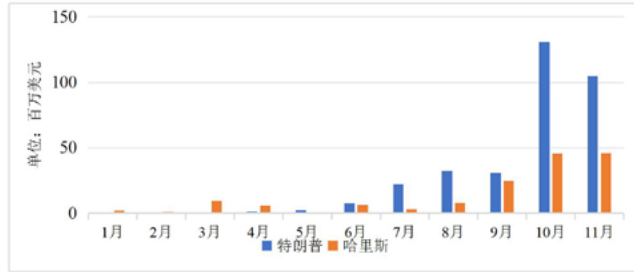


图 1. 2024 年美国大选周期来自硅谷科技精英的大额捐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1]

特朗普胜选后，作为对其选举支持的回报，科技右翼通过“旋转门”机制开始系统融入美国政治权力中心。据统计，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至少有 24 个内阁级别职位及关键岗位由该群体成员出任，覆盖科技政策、国防创新、金融监管与预算分配等关键领域（见表 1）。以科技领域为例，萨克斯、蒂尔的门徒迈克尔·克拉西奥斯（Michael Kratsios）等人直接执掌构成美国科技决策咨询“三驾马车”的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等核心机构，其中，克拉西奥斯担任总统科技事务助理兼 OSTP 主任，并负责 NSTC 的日常事务；其与白宫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特别顾问萨克斯担任 PCAST 联合主席，主导 PCAST 的成员遴选，从而实质性掌握科技政策议程的设置权。^[2] 负责科技

[1] 参见英国《卫报》相关分析，Raphael Hernandez et al., “The Tech Bosses Who Poured \$394.1m into US Election, and How They Compared to Elon Musk,” *The Guardian*, December 7,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4/dec/07/campaign-spending-crypto-tech-influence>.

[2] 参见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https://www.whitehouse.gov/ostp/>;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Launches PCAST to Restore American Leadership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nuary 23,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1/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launches-pcast-to-restore-american-leadership-in-science-and-technology/> 等。

政策具体实施的国防部、商务部与能源部等部门的重要职务，亦多由科技右翼人物或其代理人担任，确保部门执行与白宫议程的高度一致，从而形成对科技政策制定、资源分配与执行监督全链条的高度掌控。除直接担任政府要职外，萨克斯、安德森与马斯克等科技右翼人士还多次在政权过渡阶段参与海湖庄园会议，以私人顾问身份在关键人事安排与政策议程设置中持续施加影响。^[1]在国防创新方面，安杜里尔公司执行董事长特雷·斯蒂芬斯(Trae Stephens)担任国防部特别顾问,直接参与国防智能化战略规划。^[2]

通过上述人事布局，科技右翼不仅进入了政治权力的核心圈层，更开始主导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其理念正通过国防采购体系改革、行政体制重组与科技治理架构调整等关键领域的结构性变革，逐步转化为具象的国家政策。这一进程标志着“硅谷—华盛顿”传统互动模式发生根本性重构：科技右翼已从体制外的游说力量，转变为政治体制内资政和决策的主导者之一。尽管该群体的根本关切集中于科技与产业领域，但其清醒认识到，技术路线的推行必然受到政治规则与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制约。因此，科技右翼在右翼加速主义政治议程推进过程中，始终注重政策工具、制度安排与观念塑造的协同适配，重点聚焦于政府行政运行机制、国防创新与采办体系、科技政策体制这三大支点，试图由点及面地推进对美国既有权力结构的重塑。

[1] 如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局长斯科特·库普尔与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人工智能高级政策顾问斯里拉姆·克里希南,均系安德森·霍洛维茨风投公司前高管,且持续保持利益关联。参见 Eleanor Pringle, “VC Billionaire Marc Andreessen Says Half of His Time Goes to Helping Trump at Mar-a-Lago,” *Fortune*, December 11, 2024, <https://fortune.com/2024/12/11/marc-andreessen-half-time-florida-trump-business-policies/>.

[2] “Trump Picks Billionaire Investor as Pentagon Deputy,” *Politico*, December 3, 2024, <https://www.politico.com/live-updates/2024/12/03/congress/trump-picks-billionaire-investor-pentagon-deputy-00192390>.

表 1 科技右翼成员在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关键岗位名单

姓名	行政职位	姓名	行政职位
科技与金融体制			
大卫·萨克斯	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沙皇（总统特别顾问）、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	格雷戈里·巴巴西	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首席信息官
迈克尔·克拉西奥斯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兼总统科技事务助理、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	斯里拉姆·克里希	白宫科术政策办公室人工智能高级政策顾问
布莱恩·昆滕斯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主席	林恩·帕克	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执行主任
雅各布·赫尔伯格	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	乔纳森·古尔德	货币监理署署长
保罗·阿特金斯	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	霍华德·卢特尼克	商务部长
国防创新与采购体制			
柯林斯·卡罗尔	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的首席幕僚 (2025 年 4 月因泄密问题被解职)	迈克尔·奥巴马达尔	陆军部副部长
道格·贝克	国防创新小组前主任 (2025 年 8 月离职)	帕特里克·维特	美国白宫数字资产顾问委员会执行主任、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代理主任
迈克尔·多德	国防部负责关键技术的助理部长、国防创新小组代理副主任	埃米尔·迈克尔	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兼负责技术和工程事务的副部长
克里斯托弗·基尔霍夫	国防创新小组主任		
行政体制与其他			
万斯	副总统	吉姆·奥尼尔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副部长
埃隆·马斯克 (2025 年 5 月 30 日离职)	政府效率部负责人、总统特别顾问 (该部于 2025 年 11 月解散)	斯科特·库珀	人事管理局局长
肯·豪厄里	美国驻丹麦大使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行政集权与去监管化：以“单一行政理论”重构国内治理生态

特朗普与科技右翼所形成的政治联盟，正以“单一行政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 为指引, 系统推进行政体系的结构集权。^[1] 该理论主张总统对行政系统及独立机构拥有绝对控制权, 旨在突破国会、法院与文官体系所形成的传统制衡。在实践中, 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令扩权、人事与财政权集中及监管回撤(Regulatory Rollbacks)三大路径, 逐步弱化分权机制, 强化以总统为核心的行政主导模式。^[2]

首先, “紧急状态声明”与行政令成为特朗普绕过国会、司法等所谓“民主制衡”的核心工具——《国家紧急状态法》赋予总统在紧急状态下暂免遵守常规立法与司法程序的特殊权力, 为特朗普政府行政扩权提供了法律依据。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多次援引该法, 以能源、边境、贸易等领域存在“紧急状态”为由推行政策议程, 规避国会审议与司法审查。仅上任百日, 特朗普就签署了143项行政令, 重点裁撤与改组教育、媒体等被视为由进步主义精英主导的部门与项目。^[3] 行政扩权的方向与科技产业的去监管化诉求保持一致, 例如, 有关裁撤教育部DEI项目、限制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对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查权限、废除拜登时期的AI伦理规则等事项的行政令, 均直接回应了科技右翼的核心诉求。

其次, 财政权与人事权的集中进一步为总统直接控制官僚体系扫清了制度障碍。在财政控制方面, 特朗普政府通过资金扣押^[4]和用途变更等举

[1] 2024年“特朗普诉美国案”裁定总统在官方行为范围内享有近乎绝对的豁免权, 为“单一行政理论”的制度化提供了司法支撑, 以实质性推动美国权力结构从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传统模式向以行政权为中心的等级化体系演进。参见Jeremy Shapiro Végh Zsuzsanna, “The Orbanisation of America: Hungary’s Lessons for Donald Trump,”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ctober 9, 2024, <https://ecfr.eu/publication/the-orbanisation-of-america-hungarys-lessons-for-donald-trump/>。

[2] Mark G.E. Kelly, “Back to the Future: Trump, DEI, and Accelerationism,” *Telos*, Summer 2025, pp.139–147.

[3] “Trump’s Executive Orders, Explained,” <https://www.bloomberg.com/features/2025-trump-executive-orders-actions/>.

[4] 资金扣押指总统或行政部门在国会已批准拨款的情况下, 可自行决定暂缓或取消部分资金支出的行为。例如, 总统认为某项拨款不符合政策优先级, 或认为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可暂时冻结或取消该笔资金的支出。

措，推动财政主导权由国会向白宫转移。特朗普再次上任初期，即发布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备忘录 M-25-13，要求联邦机构暂缓执行国会已拨付的进步主义议程项目资金，并将相应的资源重新配置于总统设定的优先事项，打破了“国会拨款、行政执行”的传统预算制衡机制。^[1]在人事权方面，特朗普通过恢复与扩大执行其第一任期签发的《在特定公务员岗位中创设 F 类职位》行政令（Schedule F），将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监管机构中大量不随总统换人而变更的公务员转为政治任命岗位，扩大总统人事任免权；解雇了 16 名独立监察长及十余名曾对其提起诉讼的联邦律师，组建起高度忠诚的执政团队。^[2]与此同时，在“政府效率部”主导下，联邦政府规模大幅精简：截至 2025 年 5 月，已裁撤 58566 个联邦职位，76290 名雇员接受离职补偿，22 万名试用期雇员被解雇，显著削弱了民主党的政治势力。^[3]此外，在“提升效能”的名义下，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系统性地清除进步主义制衡力量。（见表 2）多个部门经历深度重组：美国国际开发署被解散，部分所谓“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职能”转移至国务院；国务院内设机构从 734 个精简至 602 个，新设新兴威胁局，聚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的国家安全风险评估与政策协调；教育部相关职能下放至州政府，或转移至司法部等部门；78 个联邦咨询委员会遭撤销，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的科研职能逐步外包或转移至私营部门等等。这些举措共同指向明确的政策意图——

[1] The White House, “M-25-13 Memorandum for Heads of Executive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January 31,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03/M-25-13-Temporary-Pause-to-Review-Agency-Grant-Loan-and-Other-Financial-Assistance-Programs.pdf>.

[2] Sarah N. Lynch, Andrew Goudsward and Sarah N. Lynch, “Trump Administration Fires Team of Lawyers Who Prosecuted Him, Official Says,” Reuters, January 28, 2025, <https://www.reuters.com/legal/trump-appointed-prosecutor-opens-internal-review-justice-depts-jan-6-cases-wsj-2025-01-27/>.

[3] Christian Hetrick, “How Trump Could Disrupt the Federal Bureaucracy, from Elon Musk to Schedule F,” USC Price, November 20, 2024, <https://priceschool.usc.edu/news/trump-elon-musk-schedule-f-federal-workers/>.

系统性削减监管、教育、环境及多元平等倡议等进步主义议程，构建以行政效能与技术优先为原则的新型治理架构。

表2 特朗普第二任期各部门预算与人员削减情况

部门 / 机构	预算变化与人员削减（截至 2025 年 6 月）
国务院	裁减国内员工超 3000 人（占比约 15%）；关闭 132 个办事机构，计划迁移 137 个机构的办公地点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预算削减 26.20%；裁减超 2 万个职位（占比约 24%）
教育部	预算削减 15.30%；人员规模从 4,133 人缩减至 2,183 人（占比约 47%）
能源部	预算削减 9.4%；裁减 1,800 名雇员（占比约 13%），另解雇约 2,000 名试用期员工
内政部	预算削减 30.5%；计划将全职员工从 8.2 万人压缩至 6.2 万人（约占员工总数 24.4%），已裁减 2,980 人
环境保护署	预算削减 54.50%；计划裁减比例为 12%，已裁减 840 人（占比约 5%）
商务部	预算削减 30%；计划裁减近 1 万人（约占员工总数 20%），已裁减 1,300 人（占比约 11%）；其下属 NIST 预算削减 3.25 亿美元，NOAA 削减 13 亿美元
农业部	预算削减 18.30%；计划裁员至 2019 财年水平，即约 9,000 个岗位被裁，已裁减 5,700 人（约占员工总数 6%）
劳工部	预算削减超 33%；计划裁减 2,700 人（约占员工总数 20%），已裁减 170 人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预算削减 43.60%；拟将员工总数从 8,300 人减至 4,000 人（占比约 50%），已解雇约 780 人（8%）
社会保障局	裁减 7,000 人（约占员工总数 12%）
国土安全部	已解雇 940 名员工（约占员工总数 4%）
国防部	预算增加 1133 亿；计划对文职人员进行 5–8% 的“战略性削减”，已裁减 2.1 万名（约占员工总数 2%），将再裁减 5 万至 6 万人
司法部	预算削减 34.9%；预计总裁减比例将达到 8%，目前裁员少于 1%，涉及至少 330 个岗位
退伍军人事务部	预算削减 22%；计划裁员约 8 万人（占比超 17%），截至 2 月 26 日已解雇 2,400 余人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预算削减 85%；裁减 1,480 人（占比超 85%）
财政部	预算削减 25 亿美元；计划裁减比例为 24%，已裁员约 11,450 人（占比约 11%），将再裁减 12,740 个职位
NASA	预算削减 24%；解雇约 1,000 名试用期员工，另有 750 名员工接受延期辞职，致规模缩减约 10%
国家科学基金会	预算削减 55.80%；取消现有 37 个研究部门，代之以 5 个专注领域的集群
美国国际开发署	预算削减超 90%；约 10,000 名员工遭解雇（占比超 9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信息自制。

第三，在监管层面，新一届特朗普政府通过“监管回撤”机制，不仅系统性解除对科技与金融资本的制度约束，更通过规则重构将监管权力向白宫集中。其颁布的《通过放松监管释放繁荣》行政令确立“十换一”原则，规定各联邦机构每颁布一项新监管法规须同时废止至少十项旧规，重点涵盖投资、国防采购、金融、科技等领域。^[1] 该机制以量化方式强制压降监管总量，实质上剥夺了劳工部、环境保护署等各专业机构基于实际情况的裁量权，使监管议程从属于行政意志。在具体政策领域，人工智能监管被大幅松绑——不仅废除拜登政府时期包括 DEI 倡议、ESG 法规在内的多项监管限制，还推动建立“单一联邦标准”并立法禁止各州在未来十年内新增 AI 监管。此举在实现全国统一低监管环境的同时，也收回了州级监管自主权，将规则制定权集中于联邦行政体系。在能源与环境领域，监管规则被嵌入“日落条款”——除非经行政管理与预算局重新批准，否则五年后自动失效。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在此过程中被赋予核心审查权，有权拒绝为不符合放松监管目标的部门或项目提供资金，借此获得对各机构规章的实质性否决权，从而将监管体系的最终控制权牢牢掌握在白宫手中。以上一系列举措共同形成一条贯穿人事、预算与规则制定权的权力集中链条，显著强化了总统在联邦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而国会、司法与独立机构的制衡功能则被相应被弱化。

（三）科技右翼主导下的国防创新生态重构：“科工复合体”崛起

长期以来，《联邦采购条例》（FAR）的复杂流程与高昂合规成本构成结构性障碍，使科技企业与国防初创企业难以进入美国国防军工市场。尽管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小组（DIU）被授权采用“其他交易授权”（OTA）和快速能力办公室（RCO）政策等灵活采购机制，但这些合同占比仍低于 5%，

[1]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Launches Massive 10-to-1 Deregulation Initiative,” January 31,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1/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launches-massive-10-to-1-deregulation-initiative/>.

无法满足硅谷的需求。^[1]面对此现状,科技右翼通过推动预算重组和采购体制改革以及加大人事渗透等途径,引导国防资源向硅谷倾斜,逐步形成挑战传统军工复合体的“科工复合体”。

一是国防预算的结构性引流。2026财年国防预算中,科技研发经费大幅提升至1790.7亿美元,较2025财年增长26.7%,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无人系统及太空技术^[2];该预算还首次设立134亿美元的自主人工智能专项拨款与151亿美元网络安全防护资金;特朗普为太空军拨付260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流向参与“金穹”(Golden Dome)导弹防御计划的商业航天企业,如SpaceX、Blue Origin及Rocket Lab等企业,并将商业航天企业定位为国防能力建设的“核心参与者”。^[3]此举标志着国防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硅谷输送。^[4]与之相呼应,美国军事技术开发与部署机制正经历系统性变革——科技右翼通过强化国防创新小组、“加速创新技术采购和部署”(APFIT)计划与战略资本办公室(OSC)三大机制,实现从原型开发、快速采购到资金保障的全流程整合。^[5]三大机制均由科技右翼核心成员主

[1] 国防部通过OTA机制签订的合同价值从2016年13亿美元飙升至2022年107亿美元,自2016年以来,国防创新小组88%的OTA合同流向了非传统国防承包商。参见U.S. Department of War, “Defense Innovation Unit,” <https://www.war.gov/Contact/Help-Center/Article/Article/2762901/defense-innovation-unit/>。

[2] “Department of Defense Budget Fiscal Year 2026,”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2025, https://comptroller.war.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26/FY2026_r1.pdf。

[3] Sandra Erwin, “At Blue Origin, Hegseth Escalates Criticism of Legacy Defense Procurement,” *SpaceNews*, February 2, 2026, <https://spacenews.com/at-blue-origin-hegseth-escalates-criticism-of-legacy-defense-procurement/>。

[4] Leo Shane III, “Trump Promises \$1 Trillion in Defense Spending for Next Year,” *Defense News*, April 8, 2025, <https://www.defensenews.com/news/pentagon-congress/2025/04/08/trump-promises-1-trillion-in-defense-spending-for-next-year/>。

[5] 美国国防创新小组拥有快速原型开发与合约授权职能,旨在加速引入商业领域先进技术;其补充机制“加速原型向生产转型资助计划”(APFIT)则专注于支持已完成研发但缺乏量产资金的技术与产品,通过快速采购授权推动其实际部署;而战略资本办公室致力于吸引并扩大对关乎美国国家与经济安全的关键技术的私人投资,运用债务与股权等金融工具为其规模化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形成从技术原型、生产部署到规模扩张的完整创新支持体系。

导，纳入国防部研究与工程财务监督委员会统一管理，并获特朗普大幅扩权增资。以国防创新小组为例，其 2025 财年预算增至 13 亿美元，获授权在各军种范围内简化武器装备、技术原型开发与 OTA 流程，为硅谷初创企业和风险资本开辟进入美国国防市场的“快速通道”，缩短它们的技术转化与资本回报周期。在此轮调整中，APFIT 与战略资本办公室的职能与资源均获得实质性增强。APFIT 被确立为永久性采办途径，并获得了新一届特朗普政府额外划拨的 10 亿美元专项资金；战略资本办公室的权限范围则扩展至军民两用技术领域，国会向该办额外注资 15 亿美元，并授权其提供高达 2000 亿美元的贷款与担保，使其融资能力得到跨越式提升。这一系列升级旨在更高效地对接国防科技初创企业、风险资本与私募股权，系统化解高潜力初创企业在成长周期中所面临的“耐心资本”短缺问题。^[1]

二是国防采办体系同步由“合规优先”向“效率优先”转型。2025 年 4 月，特朗普签署《国防采购现代化与促进国防工业基础创新》行政令，设立“配置指导委员会”取代传统多层审批机制，要求优先采用商业解决方案（CSO）等灵活采购工具，以规避《联邦采购条例》的约束。此外，国防部将固定价格合同确立为商业采购的默认选项，显著提升了成本控制能力较强的硅谷企业的竞标优势。例如，安杜里尔与通用原子公司凭借供应链与研发效率的优势，成功击败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和诺斯罗普·格鲁曼等传统军工巨头，最终获得美国空军总价值 70 亿美元的“协作式作战飞机”（CCA）智能自主无人机系统项目订单。^[2]

三是国防军事领域的“旋转门”与游说机制被重塑。传统上，该机制主要表现为前防务、情报官员与传统军工企业之间的双向流动。科技右翼则重构了这一人事流动路径，推动前国防与国家安全高级官员加速流向国防科技公司、大型科技企业及风险投资机构。据统计，超过 50 名国防部前

[1] 参见 Valerie Insinna, “Congress Passes Trump’s Reconciliation Megabill with \$150B for Defense,” Breaking Defense, July 3, 2025, <https://breakingdefense.com/2025/07/congress-passes-trumps-reconciliation-megabill-with-150b-for-defense/>.

[2] “Collaborative Combat Aircraft,” Shephard, <https://plus.shephardmedia.com/programmes/detail/collaborative-combat-aircraft-cca-usa/>.

高级官员进入风险投资与私募领域，包括国防部前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Work）、大卫·诺奎斯特（David Norquist）等数十名来自五角大楼及国家安全机构的退休官员受聘于国防科技公司担任高管或顾问。^[1]同时，科技右翼建立起一套新型游说机制，通过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国防部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办公室、国防创新小组硅谷联络处及战略资本办公室等渠道，直接游说国家安全与情报部门，从而绕开传统军工企业所依赖的军事委员会、国防拨款小组等国会组织，大幅提升其政策影响力。这些变化表明，由硅谷科技企业、国防部、国会与白宫构成的“科工复合体”正系统性挑战传统军工复合体。特朗普胜选之后，帕兰蒂尔与安杜里尔便联合十余家国防科技企业，共同竞标总价值高达8500亿美元的军事合同^[2]，标志着新兴力量已具备与传统军工巨头直接竞争的资源整合能力。

（四）金融控制权转移的博弈：科技右翼对华尔街的冲击

科技右翼通过在大选期间政治献金和组织动员为特朗普提供决胜支持，由此深度介入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人事任命与制度重构，推动数字金融领域的主导权从传统的华尔街体系向硅谷主导的加密货币生态转移。在制度层面，特朗普推动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出台了《指导和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GENIUS，又称《天才法案》）和《2025年数字资产市场清晰度法案》（CLARITY），为加密货币及数字资产确立系统性的联邦监管架构，明确资产属性，并通过立法禁止美联储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从而切断传统金融体系向数字货币领域的延伸路径。与之配套的是一系列关键岗位的人事安排：设立“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沙皇”一职，由大卫·萨克斯主导；任命支持加密的保罗·阿特金斯（Paul Atkins）执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1] Eric Lipton, “New Spin on a Revolving Door: Pentagon Officials Turned Venture Capitalist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0,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12/30/us/politics/pentagon-venture-capitalists.html>.

[2] George Hammond and Tabby Kinder, “Palantir and Anduril Join Forces with Tech Groups to Bid for Pentagon Contracts,” December 22,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6cfdfe2b-6872-4963-bde8-dc6c43be5093>.

布莱恩·昆滕斯（Brian Quintenz）领导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形成对规则制定节点的全面掌控。此外，特朗普还推动建立国家比特币储备、取消比特币资本利得税、拓宽银行服务渠道并简化合规流程，为加密企业进入主流金融系统提供制度便利。

以上举措对传统金融秩序构成直接冲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支付结算体系面临“去银行化”。基于区块链的稳定币实现点对点实时清算，使跨境支付成本降至传统银行的 1/10，结算时间从数日缩短至秒级，直接侵蚀银行依赖手续费的盈利模式。更深层的影响在于，稳定币的等额储备机制形成结构性挤压——每流入 1 美元即产生 1 美元美国国债需求，间接抽离银行体系的可贷资金。^[1]美国财政部在 2025 年 4 月发布的报告中估算，加密货币可能导致银行业面临高达 6.6 万亿美元的存款流失^[2]，这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二是数字货币控制权发生主体转移。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推动国会立法阻止美联储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使得数字货币规则制定权由华尔街—美联储体系转向硅谷主导的加密货币生态。《天才法案》中“禁止稳定币支付利息”的条款，表面上是限制加密行业，实则是传统金融资本与科技金融势力达成的一项制度性妥协。该条款直接保护了传统银行的核心利益——廉价存款来源，避免因稳定币生息功能而引发大规模资金外流。对推动法案的科技右翼而言，这是一次以退为进的策略性让步：以放弃稳定币的生息属性为代价，换取加密货币获得合法联邦监管框架的根本性突破，从而为行业的长期发展扫清障碍。^[3]

[1] 陈卫东等：《全球货币治理：稳定币的影响、风险与对策》，载《国际经济合作》2025 年第 5 期，第 1—18, 91 页。

[2] 参见 Treasury Borrowing Advisory Committee, Digital Money,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April 30, 2025,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221/TBACCharge2Q22025.pdf/>; Rob Copeland, “Behind Wall Street’s Abrupt Flip on Crypto,”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3,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8/13/business/wall-street-banks-crypto-stablecoins.html> 等。

[3] 参见 Chuck Daly et al., “The GENIUS Act: A Framework for U.S. Stablecoin Issuance,” *The Banking Law Journal*, Vol.142, No.10, November–December 2025, pp.482–488。

面对特朗普政府推动加密货币制度化、科技右翼力推比特币战略储备与稳定币合法化的趋势，华尔街的抵制已从隐性转向显性。2025年以来，花旗、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等四大行相继终止对 Unicoi n、Anchorage Digital 等加密企业的服务，并提高开户门槛。美国银行家协会联合游说美国货币监理署推迟加密企业申请国家银行牌照。^[1] 这些行动表明，加密货币集团与传统金融资本的矛盾已从理念分歧演变为制度性对抗——前者试图重构货币发行与支付清算的底层架构，后者则通过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与市场封锁维护既有秩序。^[2] 两大集团的利益冲突将持续激化，并重塑美国金融权力的分配格局。

三、霸权重塑与规则压制：科技右翼牵动的美国对外战略转向及影响

在完成对美国国内政治体制与治理架构的系统性重构后，科技右翼将其权力逻辑进一步投射于对外战略层面，通过出口管制、供应链重构与技术标准锁定，构建系统性的对华战略挤压态势，推动国际秩序向以美国技术霸权为核心的非对称体系演进。“金穹”、“星际之门”（Stargate）“创世计划”（Genesis Mission）等项目的相继推出，正是科技右翼主导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技术霸权战略深度融合的集中体现。

（一）国家安全与技术霸权的深度绑定

在完成对美国国内政治体制与治理架构的重构后，科技右翼将其政治议程进一步投射于对外战略层面。以“金穹”导弹防御计划、“星际之门”

[1] Banking Exchange staff, “Banking Lobby Calls for Halting of Crypto Bank Licenses,” *Banking Exchange*, July 23, 2025, <https://www.bankingexchange.com/news-feed/item/10371-banking-lobby-calls-for-halting-of-crypto-bank-licenses>.

[2] 监管俘获指政府监管机构在运行过程中，往往被其所监管的行业或利益集团所“俘获”，使监管政策偏离公共利益目标，转而服务于被监管者的私利。参见 George J. Stigl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2, No.1, 1971, pp.3-21。

人工智能投资计划及“创世纪计划”为代表的三大战略部署，分别聚焦军事防御、算力供给与科学突破三个维度，在功能上深度耦合：“星际之门”提供规模化算力基础；“创世纪计划”利用国家实验室数据和算力推动科学前沿突破；“金穹”则将上述相关能力转化为具体军事部署，构建覆盖陆、海、空、天的多层拦截体系。三大计划在科技右翼主导下同步推进，标志着美国正将国家安全与技术霸权战略深度绑定，也成为硅谷及科技右翼获利最为丰厚的制度安排。

其一，“金穹”计划。2025年1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启动美国本土全域导弹防御计划，同年5月更名为“金穹”，旨在构建覆盖美国本土的全域导弹防御体系。该计划整合天基传感器网络、太空与陆基拦截平台及人工智能指挥控制系统，其中SpaceX主导天基拦截能力建设，安杜里尔承担自主感知与边缘AI系统，帕兰蒂尔出任指挥控制“神经中枢”，由此形成以硅谷科技右翼为核心的架构。^[1]据白宫估算，总预算超175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则评估仅有限天基拦截系统的20年成本上限即高达5420亿美元，其中相当大部分将流向SpaceX、安杜里尔、帕兰蒂尔等科技右翼关联企业。^[2]

其二，“星际之门”计划。该计划由OpenAI、甲骨文以及日本软银等企业联合创立的私营合资实体主导，承诺4年内在美投资5000亿美元、建设10吉瓦AI算力网络。截至2025年9月，已新增五处数据中心选址，规划总容量近7吉瓦，旗舰基地德克萨斯州阿比林（Abilene）已率先投运。^[3]国际战略上，该计划以推广“民主AI”、对抗“威权AI”为旗号，邀请各国政府

[1] CSIS, “America’s ‘Golden Dome’ Explained,” April 6,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mericas-golden-dome-explained>.

[2] 参见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Effects of Lower Launch Costs on Previous Estimates for Space-Based, Boost-Phase Missile Defense*, May 5, 2025, <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2025-05/61237-SBI.pdf> 等。

[3] OpenAI, “OpenAI, Oracle, and SoftBank Expand Stargate with Five New AI Data Center Sites,” February 19, 2026, <https://openai.com/index/five-new-stargate-sites/>.

联合投资本地 AI 基础设施，阿联酋、挪威、阿根廷、印度等国已相继跟进。^[1]

其三，“创世纪计划”。与“星际之门”由私营企业主导不同，“创世纪计划”是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主导的国家科研资产战略行动。该计划旨在依托美国能源部的 17 个国家实验室基础设施和底层资产，通过推动跨部门协同和公私合作，构建一个集高性能算力、AI 建模框架、科学数据集于一体的综合研究平台，支持大规模科学基础模型的训练与创新。^[2]

就总体战略影响而言，三大计划正在从三个维度重塑全球格局。在军事战略层面，“金穹”致力于构建全球首个综合天基拦截能力的导弹防御体系，将美国战略防御边界从大气层延伸至太空，实质性挑战冷战以来以“相互确保毁灭”为基础的战略稳定格局。在技术竞争层面，“星际之门”意在构筑对潜在竞争对手的“算力护城河”，以在基础设施总量上形成规模优势；同时，该计划通过“OpenAI for Countries”等国际拓展项目，将美国技术标准嵌入参与国的数字体系，推动形成以美国技术架构为核心的国际技术规则体系。在科研创新层面，“创世纪计划”旨在将分散于国家实验室的数十年联邦科研积累整合，并加速将其转化为实际应用，从而在核裂变与聚变能源、量子信息、半导体与微电子、生物技术、先进制造、关键材料等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领域形成美国的绝对领先地位。总之，这些计划都直接源于美国对中国等所谓“战略竞争对手”在军事、科技等领域快速发展的战略焦虑，并根植于“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和服务于霸权竞争的功利主义导向，核心目的在于系统性锁定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优势。^[3]

[1] 参见“Introducing OpenAI for Countries,” OpenAI, May 7, 2025, <https://openai.com/global-affairs/openai-for-countries/>; Kelsey Quinn, “Tech Stack Diplomacy: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U.S. AI Export Strategy,” *New Lines Institute*, January 20, 2026, <https://newlinesinstitute.org/tech-econ-sov-sec/tech-stack-diplomacy-policy/>。

[2] “Genesis Miss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ecutive Order — President Trump Establishes National AI Platform and Objectives for Issues of National Significance,” July 29, 2016, <https://ktslaw.com/en/Insights/Alert/2025/11/Genesis-Mission-Artificial-Intelligence-Executive-Order>.

[3] 参见钟言：《“创世纪计划”：美国霸权焦虑下的科技困局》，求是网，2025 年 12 月 22 日，<https://www.qstheory.net/20251222/43a0c46315894996b6bf9c9f1b0860b8/c.html>。

（二）对华战略挤压：从技术遏制到标准规则的全方位压制

科技右翼与右翼民粹主义因意识形态与社会基础的根本对立，在移民、贸易等核心政策领域存在深刻分歧。例如，H-1B 签证争论迅速演变为种族化冲突，充分暴露了这一脆弱性。^[1]然而，中国同时作为硅谷技术垄断与全球市场的实际竞争对手，以及美国右翼民粹主义长期建构的“假想敌”，这一定位为右翼民粹和科技右翼两股势力提供了战略契合点。对华强硬政策因而成为双方巩固联盟的战略工具——科技右翼藉此维护技术霸权，右翼民粹主义借此强化民族主义动员。在科技右翼推动下，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正在从政策层面升级为国际战略架构的重塑，其以“技术民族主义”为核心工具，通过系统性、制度化的战略挤压，对中国构成多维度、深层次的挑战。

一是构建排他性全球技术与供应链体系，意图将中国系统性隔离于关键领域之外。关键矿产（稀土、锂、钴等）是半导体制造、人工智能芯片及国防装备的基础性投入要素，是人工智能算力与国防电子系统的底层支撑。科技右翼深谙关键矿产供应链对其技术霸权的基础性意义。正如美国智库所指出，中国目前控制着全球约 60% 的稀土开采量和约 90% 的加工能力，稀土供应中断“将对美国关键军事平台与科技产业造成严重影响”。^[2]正是基于上述“焦虑”，美国将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25 年 12 月，美国主导推出的“硅和平”（Pax Silica）战略倡议，联合日本、韩国等 9 国，旨在围绕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构建闭环供应链。^[3]该倡议由科技右翼人物、美国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牵头。2026 年 2 月，美国又推出“金库工程”（Project Vault）与“资

[1] Ali Breland, “MAGA Is Starting to Crack,” *The Atlantic*, January 23, 2025,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25/01/maga-trump-tech-nationalist-conflict/681422/>.

[2] Gracelin Baskaran, “What China’s Ban on Rare Earths Processing Technology Exports Means,” CSIS, August 1,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at-chinas-ban-rare-earths-processing-technology-exports-means>.

[3] “Will US-Led ‘Pax Silica’ Be a New Dawn for the International AI Supply Cha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24, 2025, <https://www.scmp.com/news/us/diplomacy/article/3337551/will-us-led-pax-silica-shore-minerals-supply-chains-and-counter-chinas-dominance>.

源地缘战略参与论坛”(FORGE)。前者旨在加速美国国内矿产开采及加工能力建设,建立关键矿产国家战略储备体系,以保障稀土、锂、钴等60多种关键矿产的供应安全。^[1]该工程联合通用汽车、波音、谷歌等企业,推动关键矿产加工产能从中国向美国本土及盟友国家转移。后者则是拜登政府时期“关键矿产伙伴关系”(MSP)的升级版,致力于构建关键矿产的多边优惠贸易区,通过设定矿产价格下限及可调节关税机制,应对所谓“中国低价倾销行为”。^[2]上述举措标志着美国对华遏制已从单一技术封锁转向全球产业链重构;具体路径则是配合价值链回流、近岸外包与友岸外包策略,推动形成将中国边缘化的国际经济与技术秩序。

二是构建“动态调整”的出口管制体系,对华实施差异化精准遏制。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对人工智能高性能芯片、量子计算等尖端领域维持全面封锁,对非尖端领域则选择性放宽管制,并根据中国技术演进动态调整管制梯度。^[3]这一策略的核心逻辑在于诱使中国形成对美国技术架构(芯片、基础模型等)的路径依赖,在维持美企市场收益与研发循环的同时,实质性阻碍中国自主技术体系的完善与全球竞争力的提升。^[4]例如,特朗普上台后,英伟达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H200芯片仍维持了对华销售渠道,意图使中国企业在训练框架、软件生态等层面持续依附于英伟达技术栈。

三是针对已取得关键技术突破的中国企业实施精准打击,以压制其在特定赛道的领先优势。以量子计算为例,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国盾量子、

[1] Gracelin Baskaran, “Project Vault: A Minerals Security Backstop,” November 2, 2026,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roject-vault-pillar-economic-security>.

[2] Gracelin Baskaran and Meredith Schwartz, “Critical Minerals Ministerial Introduces New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y,” February 13, 2026,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ritical-minerals-ministerial-introduces-new-international-cooperation-strategy>.

[3] Daniel Castro, “Trump Administration Gets H200 Chip Sales to China Right and Wrong,” December 18, 2025, <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25/12/18/trump-administration-gets-h200-chip-sales-to-china-right-and-wrong/>.

[4] Jack Burnham, “Rolling Back Export Controls, U.S. Offers China Powerful AI Chips,” *FDD*, December 10, 2025, <https://www.fdd.org/analysis/2025/12/10/rolling-back-export-controls-u-s-offers-china-powerful-ai-chips/>.

国科微等多家中国企业先后被列入“实体清单”，面临市场准入限制。^[1]又如2026年2月，美国国防部将宇树科技、阿里巴巴、比亚迪、禾赛科技等78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涵盖互联网、新能源、智能驾驶、生物医药、机器人等多个新兴领域。此类措施旨在通过定向遏制，消解中国在重点领域的领先优势。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科技右翼正以军事领域的技术标准为支点，向民用产业与全球治理规则体系渗透，系统性压缩中国技术的国际发展空间。美国将防务合作转化为技术标准扩散的制度性通道——利用盟友对“互操作性”的刚性需求，将美式技术标准深度锚定于其作战体系。这种始于军事领域的技术依赖，具有极强的路径依赖与排他性^[2]，具备向民用技术治理领域进行系统性外溢的强大势能。美国可将相关技术标准推向人工智能、跨境数据等民用领域的国际规则谈判中，并将其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共同立场以设定技术标准。若此模式进一步延伸至亚太、欧洲等地区的安全合作框架，美国即可借助与地区盟友及伙伴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推广美式数字技术标准，形成从军事到民用的多层次技术规则网络。这不仅会系统性压缩中国技术路线与产品的市场空间，更将在规则层面形成对中国技术的结构性排斥机制，使其难以获得区域性的标准认可与市场准入资格。科技右翼主导的这一进程，实则通过军事领域的数字技术标准外溢掌控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话语权，从而阻断中国将制造与应用创新优势转化为标准制定权的上升通道。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就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构成结构性、系统性的长期挑战。

（三）“唐罗主义”与西半球资源攫取：科技右翼的战略矿产布局

科技右翼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跨大西洋防务关系与对华技术遏制，而是进一步延伸至西半球乃至北极地区的资源控制领域。特朗

[1] Stephen Dyer et al., “China’s Proposed Export Ban on LiDAR Technology: What Impact Will It Have o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lixPartners, April 5, 2025, <https://www.alixpartners.com/insights/102ic0t/chinas-proposed-export-ban-on-lidar-technology-what-impact-will-it-have-on-the/>.

[2] W. Brian Arthur,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99, No.394, March 1989, pp.116-131.

普在第二任期伊始即展现出对西半球的强烈领土与资源扩张意图，其对格陵兰、巴拿马运河乃至加拿大的主权主张，被学界概括为“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其表述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明确将西半球界定为关乎美国边境安全、供应链及地缘竞争的核心利益前沿，宣称将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1]“唐罗主义”还将美国的战略触角从传统的拉美“后院”向北极延伸，其核心驱动力正是科技右翼对关键矿产资源的战略需求。其核心逻辑在于，在大国竞争与供应链重构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必须确保对西半球及其延伸地带关键资源的绝对控制，以支撑其科技优势与国防能力。

格陵兰成为“唐罗主义”的首要目标绝非偶然。作为全球稀土、锂、钴、铀等关键矿产的潜在储量大国，格陵兰的地质资源对于支撑人工智能芯片、电动汽车电池、航空航天材料及国防科技产业链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与此同时，格陵兰是美国太空军唯一的海外基地所在地，其皮图菲克（Pituffik）太空基地承担着关键的导弹预警与卫星追踪任务，对于“金穹”计划等太空防御体系的运行至关重要。正是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任命“Paypal黑帮”核心成员之一的肯·豪厄里（Ken Howery）出任驻丹麦大使，意图通过外交渠道推进对格陵兰矿产资源的获取，服务于科技右翼主导的供应链重构战略。与此同时，“硅和平”、FORGE等机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布局同样指向西半球，美国正积极推动与加拿大、墨西哥及部分拉美国家的矿产开发合作，格陵兰、加拿大北部及拉美锂三角（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的矿产资源，成为这一战略版图的潜在对象。在此意义上，“唐罗主义”并非简单的领土扩张冲动，而是科技右翼将技术霸权、资源安全与地缘政治进行系统性整合的战略实践。科技右翼正推动美国在西半球及北极地区构建服务于硅谷利益的资源控制体系。这一进程的深远影响在于，它将传统地缘政治竞争与科技产业链重构深度捆绑，关键矿产日益成为大国技术博弈的核心战场。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结 语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美国科技右翼的崛起，本质上是技术生产力的跃升对传统政治经济结构产生冲击的集中体现。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当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加速变革，必然推动生产关系乃至整个上层建筑的深刻调整。科技右翼将“加速主义”理念转化为政治实践，通过整合硅谷资本、技术精英与右翼民粹力量，不仅重构了美国国内权力格局，更驱动其对外战略向“技术民族主义”与“规则排他”方向急剧转向。这一进程在释放巨大技术潜能的同时，也因其强烈的排他性、竞争性与去监管冲动，为全球治理秩序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当科技被赋予超越伦理与合作的“加速”使命，人类共同面临的已不仅是发展的机遇，更是对治理智慧与文明方向的严峻考验。

面对技术变革浪潮带来的生产关系与全球秩序重塑，中国的选择是明确的：中国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反对任何形式的科技霸权与单边制裁。通过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参与并引领相关全球规则与标准的讨论制定，中国致力于为弥合数字鸿沟、防范技术风险、促进知识共享作出建设性贡献。这不仅是为了应对当前科技右翼所代表的竞争态势，更是为了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引导全球科技发展朝向更加平等、包容、以人为本的方向演进，让技术进步的成果惠及所有国家与所有人，共同塑造一个更加安全、繁荣、可持续的人类未来。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始终是负责任的建设者、合作者与贡献者，为人类携手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提供具有东方智慧的方案与稳定可靠的力量。

【收稿日期：2025-12-20】

【修回日期：2026-02-24】

（责任编辑：邢嫣）